

气候变化的安全意涵：溯源、概念及启示*

傅 聪

内容提要：气候系统正经历着人类活动导致的变暖过程。气候是人类维持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气候变化因此成为直接沟通环境与安全问题的联结点。本文探讨气候变化的安全含义，尝试对气候安全的概念进行界定。文章首先阐述了气候变化与安全研究源于环境安全研究，历经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囊括了气候安全化研究、安全纽带研究、现代风险社会中的气候安全等研究侧面；而后尝试用概念分析法，从安全主体、安全价值、威胁来源、指涉对象和维护方式五方面界定“气候安全”，并指出气候安全具有安全威胁和风险二元一体、威胁和风险分配不平衡、安全主体多元并与责任者同一，以及成为联结安全问题的纽带等特征。最后文章总结并提出气候安全给安全政治带来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气候安全 概念 特征 威胁 风险

当前，气候系统正在经历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暖化过程。气候对人类维持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要影响，气候变化因此成为直接沟通环境与安全问题的联结点。美国、英国、德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组织率先提出气候安全问题，公布了各自的气候变化安全影响文件。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气候变化在 2007 年被推上安全议题的新高度。2007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 (IPCC) 发布的第四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了气候变化引发的安全威胁。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了 IPCC 委员会和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 (Al Gore)。同年 4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气候变化、

* 本文受到科技部“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2012BAC20B06) 资助。感谢匿名评审提出的宝贵意见。

能源和安全问题进行高级别辩论。会后,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问题特使韩升洙说:“气候变化已经不仅仅是环境问题了,它是一个关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它也是国际安全问题。或者说,气候变化既是国内政治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全世界都应该对此给予关注。”^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联合国和西方大国不断地将气候变化议题政治化、安全化,以提高全球对气候变暖的关注度、加大气候治理的行动力度。学界也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其中出现了一些以“气候安全”为题,讨论其安全化过程和结果的文献。^② 气候变化安全化的研究成果向我们展示了气候变化具有的安全属性和行为体对气候变化安全意义认知的过程。但是,对于如何界定气候安全的概念,分析概念的构成要素、性质和特征,认识“气候安全”与“环境安全”的关系,目前学界的讨论尚不充分。

“安全”本身是一个存有本质性争议的概念,如奥利·维夫所说,安全具有的功能性使安全概念在本体论层面具有非给定性,会随时间而改变。^③ 气候变化是一个构筑于自然科学认知基础上的政治问题。气候安全也将随着气候变化科学发展的深入,以及气候治理经验的不断积累,在概念中涌现出新内涵。尽管如此,当前在特定语境内界定“气候安全”术语的内涵与外延仍是构建共同的研究背景、明晰气候安全研究问题与路径所必需的基础性工作。

本文分为三大部分,首先回顾气候变化与安全研究的演进过程,其次尝试借鉴安全研究的分析框架界定“气候安全”概念,并归纳气候安全的特征,最后文章就气候安全与气候风险、气候安全治理工具、路径和体系等方面总结气候安全之于安全政治的启示与意义。

一 气候安全研究溯源:气候变化与安全研究

气候是环境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研究也离不开环境安全研究的积淀。环境安全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开始的绿色运动。《寂静的春

^① <http://news.sina.com.cn/c/2007-06-15/095413236331.shtml>, 2015 年 9 月 2 日访问。

^② 例如 Maria J. Trombetta,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Analyzing the Discours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1, No.4, 2008; Marvin S. Soroos, “Global Chang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the Prisoner’s Dilemm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1, No.3, 1994; Nicole Detraz and Michele M. Betsill,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or Whom the Discourse Shif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10, 2009, pp.303-320.

^③ Ole Waever, “Peace and Security—Two Concep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 S. Guzzini and D.Jung eds., *Analysis and 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51-65.

天》一书掀起了一场波及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①《增长的极限》一书让人们意识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只有在环境、资源容量极限内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全球均衡。^②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了当代环境问题与保护全球环境的战略。此时,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关注到自然环境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学者们开始拓展安全研究的范围,将环境的变化视为威胁来源及指涉对象进行分析。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的“重新界定国家安全”和理查德·厄尔曼(Richard Ullman)的“研究重新界定安全”是两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布朗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安全威胁将会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安全威胁将来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减少的石油储备和地球生物系统的恶化威胁着各国各地的安全。^③厄尔曼认为,除传统军事关切外,环境变化这样的内生性威胁也应被包含在国家安全威胁概念之中。^④二人将安全研究变量从传统的军事、政治层面向环境与资源层面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开启了环境安全研究的先河。但是,在核威胁压迫下的冷战时期,环境安全研究在学界和政界很少被关注。

冷战结束前后,基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对军事安全地位的反思,安全研究的关注点从战略领域(集中于军事和政治方面)开始向经济、社会、环境、气候等领域延伸。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环境关系的安全架构,在这里气候变化被作为环境维度内的一个变量来考察。其代表人物巴瑞·布赞(Barry Buzan)认为,若没有虑及来自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的行为体和机理就很难充分理解“安全”概念。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以及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都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意义。但对任何一种安全的全面理解只有在与另一种安全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获得。^⑤哥本哈根学派认为,环境安全关系到地方和地球生物圈的维持——作为基本的支撑维持着全人类进取精神依赖的系统。^⑥环境部门关注人类活动与作为基本支持系统的周围生物圈的关系。安全的环境维度——环境安全——成为安全研究的一个新分支。

环境安全研究和气候安全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力量的驱动。联

① 参见[美]蕾切尔·卡森著:《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美]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著:《增长的极限》,李涛、王智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③ Lester R. Brown, “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Watch Paper 14* (Washington, D.C.: World Watch Institute), October, 1977.

④ 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8, No.1, 1983, pp.129-153.

⑤ [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丹麦]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⑥ 同上,第31页。

联合国环境署、发展计划署、安理会、大会,以及成立于1988年的IPCC推动环境、气候问题进入属于“高阶政治”的安全讨论范畴,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优先议题。“环境安全”术语是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报告指出,“安全”的定义必须扩展,要包括环境恶化和发展条件遭到破坏,而不仅是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气候变化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影响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进入21世纪,全球变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重大灾害,其间接引发的安全危机让气候变化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最受瞩目的话题。气候安全也因此日益独立于环境安全,成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议题。

从研究剖面中可以发现,环境与气候安全研究中存在着传统和非传统的两种安全视角。冷战结束前的早期环境安全研究大多遵循将国家作为安全主体的传统研究视角,注重环境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环境变化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上文提到的布朗和厄尔曼的研究即为此例。环境与冲突关系研究也多从威胁国家安全角度出发,探讨环境压力、资源稀缺与暴力冲突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1997年IPCC报告指出,在拉丁美洲,气候变化相关的影响作用于水资源,足以在国家、地区和取水者之间引发冲突。气候相关的环境退化不断增长可能会加深地区国家间和国际冲突。^①托马斯·霍默-迪克逊(Thomas Homer-Dixon)认为,资源短缺造成的大规模内部冲突将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之地。^②中国学者张海滨从国家安全的视角提出如何理解环境安全和气候安全,并提出中国国家安全的框架。^③

人类安全概念从非传统安全角度,丰富了环境安全和气候安全的主体和研究层次。1994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人类安全”概念,将环境安全界定为人类安全的组成部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人类安全不应再被理解为只是指纯军事意义上的安全,而是必须涵盖经济发展、社会正义、环境保护、民主化、裁军、尊重人权和法治”。他指出人类安全的三个基本层面,“消除贫困、消除恐惧、使后代能够继承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些是人类安全,从而也是国家安全彼此相关的基本层面”。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Mathews)总结了安全概念向国家之外拓展的过程。她指出首先需要重新界定安全并将一系列新威胁包括进去,如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其次是接受安

① 参见IPCC(1997)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② 参见Thomas Homer-Dixon, “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 Evidence From Ca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5-40; Thomas Homer-Dixon, *Environment, Security, and Viol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张海滨:“有关世界环境与安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141-158页;张海滨:“国外环境与安全问题研究述评”,《欧洲》1997年第3期,第34-41页;张海滨:《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国内国家安全视角下的环境安全研究还可参见钱箭星:“国际政治视野中的环境安全——兼论当代中国的环境安全”,《国际展望》2010年第5期,第28-38页。

全的对象不再只是国家,而是一系列在国家之上和之下的层级。^①哈里特·奎奇立(Harriet Critchley)和特里·特里夫(Terry Terriff)认为,着眼于国家的分析思路是不合适的,因为环境问题是沒有领土和政治边界的,无论居住在哪一个国家,人类都面临环境问题的威胁,换句话说,必须保护整个人类的环境质量。诺曼·迈尔斯(Norman Myers)从人类安全的角度来论述环境安全,“我这里所说的安全,是从它的全方位的意义上说的,即所有人的安全,永久的安全”。^②

安全化是环境与气候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借助“言语-行动”分析环境与气候议题的安全化过程,讨论环境与气候安全对安全理论的影响和挑战。汉斯·G·布劳赫(Hans Günter Brauch)利用安全化分析方法,绘制了气候变化在科学和决策共同体内成为国际、国家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框架轨迹。^③玛丽亚·J·特隆贝塔(Maria Julia Trombetta)分析了“气候安全”话语的出现,并探讨了环境问题安全化对安全实践的改变。她认为,环境问题的安全化对基于突发事件的安全逻辑与基于预防、管理的安全逻辑进行了整合,安全行为体的作用及安全供给方式都会随之出现新的变化。^④尼罗·R·毕斯沃斯(Niloy Ranjan Biswas)分析了环境与安全的联结点,提出环境退化通过影响个人生计,引发跨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危机,成为个人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⑤迈克尔·布尔佐斯卡(Michael Brzoska)则对气候变化安全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认为气候变化安全化并未建立在充分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气候安全化不一定意味着要采用主流的传统危机处理工具(军队、警察)应对气候变化。^⑥国内学者马建英运用安全化理论,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中的存在性威胁(“气候暖化不仅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对小岛国和沿海低地国家/地区的生存构成了直接威胁,而且会造成传染性疾病增加,从而危害到全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气候变化的“言语-行为”以及“主体间建构”的安全化过程。^⑦

① [德]汉斯·G·布劳赫:“构思联合国系统内人类安全的环境因素”,《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8年第4期,第34页。

② 张海滨:“有关世界环境与安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146-147页。

③ 相关研究参见 Hans Günter Brauch, “Securitizing Climate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0th ISA Annual Convention, New York, 15-18 February, 2008, http://www.afes-press.de/html/Brauch_ISA_NY_2.2.2009.pdf,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15。

④ Maria Julia Trombetta,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Analysing the Discours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1, No.4, 2008, pp.582-602.

⑤ Niloy Ranjan Biswas, “Is the Environment a Security Threat? Environmental Security beyond Securit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view*, Vol. XX, No. 1, 2011, pp.1-22.

⑥ Michael Brzoska,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ower of Conceptions of Security”, *Security and Peace*, No.3, 2009, pp.137-208.

⑦ 马建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理论、路径与反思”,国际关系研究:新领域与新理论——2010年博士论坛会议论文。

环境与气候安全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安全纽带研究。安全纽带思想最早出现于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会议提出了水-能源-健康-粮食-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相互管理和系统管理。“安全纽带”概念则是美国进步中心在2010年提出的。2012年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为“能源、资源和环境:新安全因素”,侧重讨论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安全纽带问题。^① 气候变暖使全球水源-粮食-能源安全纽带成为危机的最前线。世界经济论坛在2011年出版了《水安全:水-粮食-能源-气候变化纽带》,以水安全为核心讨论了水、粮食、气候变化、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相互关联的议题对水安全构成的挑战。^② 世界自然基金会2014年报告讨论了南非气候变化与食品、能源、水纽带及食品安全问题。^③ 国际能源署以及一些学者对气候变化与能源之间的安全纽带展开研究。例如,马库斯·D·金(Marcus DuBois King)和杰·古勒吉(Jay Gulledge)综述了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指出气候变化间接加剧社会不稳定和能源系统混乱,直接影响能源供应系统,并通过与气候相关的政策影响能源安全。^④ 迈克尔·沃兹和劳拉·康利(Michael Werz and Laura Conley)还讨论了气候变化、移民及其产生的安全影响,以及向传统的国家和国际安全提出的挑战。^⑤ 安全纽带研究侧重安全因素在不同治理层级间和安全议题间形成的相互关联、影响和依存关系。纽带视角推动了对环境、资源、经济、健康乃至政治、军事安全研究从单一的、割裂的研究向系统的、统合的研究转变,也让研究从技术层面提升至全球政治层面。^⑥

近年来,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气候安全研究使安全威胁分析进一步得到细化。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风险作为一种潜在的副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被释放出来。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

① 于宏源:“浅析非洲的安全纽带威胁与中非合作”,《西亚非洲》2013年第6期,第115-118页。

② World Economic Forum, *Water Security: The Water-Food-Energy-Climate Nexus*,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2011.

③ Suzanne Carter and Manisha Gulati, “Climate Change, the Food Energy Water Nexus and Food Security in South Africa”, *WWF Report*, 2014.

④ Marcus DuBois King and Jay Gulledge,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ecurity”,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37, No.2, Summer 2013, pp.25-44; Ralph Espach, Duncan Depledge and Tobias Feakin, “The Climate and Energy Nexu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ransatlantic Security”, June 2013, <https://www.cna.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ClimateEnergyNexus.pdf>,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15; Caroline Kuzemko, *The Energy Security-Climate Nexu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UK and Beyo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国际能源署至今主办了四次纽带论坛,讨论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间的纽带联系, <https://www.iea.org/workshop/4th-nexus-forum-on-climate-energy-security-nexus-water-and-energy.html>。

⑤ Michael Werz and Laura Conley,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Conflict: Addressing Complex Crisis Scenarios in the 21st Century”, 2012,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issues/2012/01/pdf/climate_migration.pdf,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15.

⑥ 参见于宏源:“浅析非洲的安全纽带威胁与中非合作”,第115-118页。

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造成影响的风险,引致了系统的、不可逆的、常常不可见的伤害。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是对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①风险社会思想促使学者开始分析气候变化中的风险因素,以及风险之于气候变化政治的意义。奥拉夫·科瑞(Olaf Corry)提出气候安全化言语-行动中的风险逻辑,认为风险-安全独立于危险-安全,构成了次等级的气候安全政治。^②克里斯·麦斯曼(Chris Methmann)和德尔夫·劳斯(Delf Rothe)认为,批判安全研究不应将“安全”和“风险”视为两种互不相干的逻辑,它们天然的连接点就存在于“世界末日”意象(apocalyptic imageries)中。^③国际环保组织“第三代环境主义”(E3G)在《风险的等级:界定气候安全风险管理框架》中认为,当前的气候安全威胁并未得到有效的管理,各国需要以综合风险管理方式应对气候变化。^④

二 “气候安全”概念界定:一种初步尝试

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的安全威胁之一。气候安全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并成为重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气候安全不应“寄居”于环境安全概念之下,而应对其概念进行细致的界定,以使气候安全政治与政策拥有更加明确的范畴和更加清晰的含义。

“安全”是一个古老而又复杂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安全概念模糊且不成熟。阿诺德·沃尔夫(Arnold Wolfers)曾说到,安全是一个模糊的符号,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⑤理查德·厄尔曼也曾说,“我们直到受到威胁、失去安全时可能才认识到什么是安全”。^⑥许多学者尝试对安全进行定性研究。阿诺德·沃尔夫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对安全进行定义,即“已获得的价值客观上无威胁之虞,主观上免于被攻击

① 参见[德]乌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② Olaf Corry, “Securitisation and ‘Riskification’: Second-order Secu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0, No.2, 2012, pp.235-258.

③ Chris Methmann and Delf Rothe, “Politics fo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The Logic of Apocalypse in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Security Dialogue*, Vol.43, No.4, 2012, pp.323-344.

④ Nick Mabey, Jay Gullede, Bernard Finel and Katherine Silverthorne, *Degree of Risk: Defining a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curity*, E3G, February 2011, http://www.e3g.org/docs/Degrees%20of%20Risk_Defining%20a%20Risk%20Management%20Framework%20for%20Climate%20Security_Full%20Report.pdf,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15.

⑤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in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67, No.2, p.485; 郑先武:“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第47-53页。

⑥ 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p.130.

的恐惧”。^① 巴瑞·布赞将“安全”简明地定义为免于威胁的自由追求。^② 在《新安全论》一书中,“安全”被进一步阐释为关于生存的、对特定指涉物构成存在性危险、需要采用超常规措施加以应对的事务。^③ 安全研究扩大派穆罕默德·阿约布(Mohammed Ayoob)对“安全”的定义是:“安全或不安全是关于内部或外部的、威胁或可能威胁破坏的,或从领土、制度、体制上严重削弱国家结构的各种脆弱性。”^④ 这些安全定义归纳出了“安全”的内核,即免于恐惧、威胁和脆弱性。

但是,对于具有诸多模糊性的安全概念来说,明确其内涵、外延还需要更为复杂的概念分析框架。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认为,概念分析可以通过澄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帮助学者们方便地开展讨论,也让决策者容易区分不同政策含义的差别。^⑤ 鲍德温提出用7个问题来分析“安全”概念,即谁的安全(security for whom)、何种价值的安全(security for which values)、安全的程度(how much security)、威胁的来源(from what threats)、安全的手段(by what means)、安全的代价(at what cost),以及安全的时段(in what time period)。^⑥ 甘地·巴伯(Kanti Bajpai)认为,安全研究应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谁的安全、何种价值的安全、受到什么威胁的安全以及如何维护安全。^⑦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研究应思考以下几个问题:谁实施安全化,什么问题(威胁),指涉谁,为什么,带来什么后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实施。^⑧ 国内学者李开盛和薛力在巴伯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谁来保障安全”,提出了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主导的安全价值、威胁的来源、安全的责任主体和实现安全的方式五大问题。^⑨

从以上几个研究框架中可以发现,学界对“安全”概念框架的必备要素已有一些共识。安全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威胁、维安手段都是各个安全概念框架中必须阐释的要素。综合上述研究框架,本文将安全主体、安全的价值、威胁来源、指涉对象和维护方式五项要素作为分析气候安全概念的框架。何种安全的价值决定了安全问题的类

①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in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67, 1952, No. 2, p.485.

②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Security Analysi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righton: Weatsheaf, 1991, p.19.

③ Barry Buzan, O. Weaver and de J. Wilder, *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olorado: Lynne Rinner Publishers, Inc., Boulder, 1998, p.21.

④ Mohammed Ayoob, “Defining Security: A Subaltern Realist Perspective”,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edited by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121-146.

⑤ David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Vol.23, No.1, pp. 6-7.

⑥ David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pp. 13-17.

⑦ 李开盛、薛力:“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与特征”,《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95页。

⑧ [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丹麦]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44页。

⑨ 李开盛、薛力:“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与特征”,第95页。

别;对威胁的识别构成了安全问题的内涵;安全主体是安全价值的享有者;指涉对象告诉我们安全政治中的参与者;维护方式显示了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安全概念分析的有机整体。

鉴于气候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安全与环境安全不仅有物理上的关联,更有认识上的联系。从与环境安全相比较的视角,分析“气候安全”的构成,或许可为界定气候安全概念提供一条尝试路径。

从前文研究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1)环境安全的主体,随着安全研究议程的深入,包含了从国家到个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多元广泛主体。(2)环境安全的价值,为作为基本的支撑维持着全人类进取精神依赖的系统。(3)环境安全的指涉对象,包含造成环境变化的国家、次国家行为体、个人,也包括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4)环境安全的维护方式为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5)环境安全的威胁来源包括:一是人类活动对地球自然系统或结构造成的威胁;例如,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氟氯化碳和其他工业废气排放对臭氧层的影响;二是人类活动对地球资源损耗造成的威胁;三是“来自自然环境而非人类活动导致的对人类文明的威胁”^①和未特别指明的、遥远的环境问题,^②或者说环境风险都归入环境威胁之中。

作为环境安全中的一个子概念,“气候安全”在安全主体和指涉对象上,与环境安全概念具有一致性。“气候安全”的价值相对于环境安全价值来说更具指定性,即为气候系统的稳定及不因为人为干扰而出现异常的变化。气候安全与环境安全的价值不同,源于二者受到的威胁来源不同。正是这些不同来源的威胁决定了气候安全概念的独特内涵,构成了其自成独立科学术语的基础。

下文选取最具科学权威性的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的《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等国际组织报告为蓝本,从其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论述中,尝试归纳当前科学界和政治界对气候安全威胁来源的一些共识。

IPCC 报告按照风险级别和证据可信度,将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影响评估为不同安全等级和紧迫程度的危险。从表 1 中可以发现,报告认为在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经济、社会、政治、军事领域,气候变化引起了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破坏、极端天气、经济受损、大规模移民、暴力冲突等一系列安全风险。报告特别指出,水文和物种变化、热浪等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粮食减产、心脏疾病增加、海平面上升都是具有现实性和

^① 可以将此类威胁通俗地理解为天灾。例如地震和火山喷发(尽管存在着一些人为作用的争论)、陨石撞击地球等。

^② [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丹麦]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 108-109 页、第 113 页。

紧迫性的危险,构成气候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其中,海平面上升造成领土安全威胁涉及了传统安全领域。

表 1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的气候威胁和风险

安全价值	威胁来源	风险来源
资源	水文系统改变	水供给不足
	物种改变	物种灭绝
生态系统	热浪、洪水、干旱、飓风、野火	热应激、暴雪、暴雨、内陆和海岸带洪水、泥石流、空气污染、干旱、缺水、海平面升高和风暴潮
国家经济	粮食减产	鱼类产品的不可持续供应、粮食减产
社会	心脏疾病增加	加重已有健康问题
		移民风险
军事、政治	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升高
		暴力冲突风险

资料来源:IPCC Fifth Assessment Synthesis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14*,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http://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5/syr/SYR_AR5_SPMcorr1.pdf.

表 2 重要政治文献中的气候威胁和风险

文献来源	威胁	风险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安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 2006 年 ^①	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它对人类构成了多方面的威胁。气候变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食物供应、居住环境,甚至导致争夺自然资源的武装冲突。气候变化必须像冲突、贫困、杀伤性武器扩散这些传统威胁一样,成为政治领导人关注的首要问题。	

^① Kofi Annan, Address to the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Nairobi, 15 November 2006, <http://www.un.org/press/en/2006/sgsm10739.doc.htm>, last accessed on 20 October 201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07年 ^①	世界已经从冷战的全球威胁转为可被称为“暖战”的全球威胁之中。我们的冲突不再使用枪支和弹药,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武器——高高的烟囱和尾气。	
联合国发展署,2007年 ^②	不可预测的、非线性事件,可能通向生态毁灭之门。气候灾难是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事件。柏拉图在亚特兰蒂斯神话中讲到洪水的摧毁性力量。玛雅文明的覆灭源于一连串的干旱。21世纪已经提供了一些面对极端气候时人类脆弱性的强力证明。	
加尧姆(马尔代夫总统),联合国第42届大会,2007年 ^③	对马尔代夫而言,海平面平均上升2米,就可以完全将马尔代夫整个国家1190个岛屿统统淹没。这将是一个国家的灭亡。即使海平面仅上升1米,一场风暴也将是灾难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潘基文,2009年 ^④	气候变化威胁到市场、经济和发展的收益。它可以耗尽食品和水的供应,引发冲突和移民,让脆弱的社区变得不稳定,甚至推翻一个政府。	
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环境署,2009年 ^⑤	气候变化是一个等不起的问题。它是对未来发展、和平和繁荣的威胁,要全球共同体高度重视,采取紧急行动。	
拉斯穆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09年 ^⑥		(海盗、网络战争)威胁是明确的。我们知道海盗是什么样子……劫持和绑架正在发生。产业和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可以计算出来……我们知道正确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气候变化影响安全的明确的后果、我们要付出的确定的代价和发生的准确时点。但是我们知道的已足够支持开展行动……我们或者现在买单,或者将来付出更高的代价。

注:此表为作者自制。

^① Mr. Pita (the Representative of Tuvalu), address to UN Security Council, 17 April 2007, S/PV.5663 (Resumption 1),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CC%20SPV%205663%20Res1.pdf>, last accessed on October, 20, 2015.

^②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Fighting Climate Change—Human Solidarity in a Divided World*,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268/hdr_20072008_en_complete.pdf,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15.

^③ http://papers.risingsea.net/Maldives/Gayoom_speech.html,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15.

^④ Ban Ki-moon, “The Sky is the Limit”, *Our Planet: The Magazine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December 2009, pp.6-7.

^⑤ WTO and UNEP,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 2009.

^⑥ Speech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nders Fogh Rasmussen on Emerging Security Risks, Lloyd’ of London, 2009,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pinions_57785.htm,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15.

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文件中,可以发现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更多被笼统地描述为威胁,和政治有了更多的关联性。它涉及战争与和平、冲突、移民、经济繁荣与发展等各种事务,甚至国家的生死存亡,并影响着整个人类。世界末日、生态与文明毁灭等修辞则将威胁与风险纳入同一个话语逻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最重要的军事同盟组织北约认为气候变化产生的危险不同于海盗和网络战争所发出的那种明确的威胁。

综上所述,气候安全受到的威胁可以归纳为:具有存在性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威胁、领土安全的威胁、水资源短缺/分配改变的威胁、粮食减产的威胁,以及一些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广泛的潜在性风险。“气候安全”则可被定义为:个人、国家、国际组织乃至全人类享有的稳定的、适宜生存的气候系统,免于人为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引发的威胁和风险的干扰,并须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加以维护的安全追求。

三 气候安全的特征及其对安全政治的启示

通过上文的概念分析,可以发现气候安全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安全事务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丰富了当前的安全政治研究,并尤其在治理方式、路径等方面给安全政治带来了新的启示。

第一,气候安全的威胁和风险二元一体。气候安全危险中既有对于环境、资源、领土、粮食的现实、紧迫的威胁,也包含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健康等广泛的风险。气候变化的安全危险存在于一条具有不同等级的存在性、急迫性和确定性的风险光谱之上。特别是在风险社会,气候安全中蕴含的不确定风险甚至多于存在性威胁。气候安全议程因风险驱动而变得更加宽泛。气候安全也并未被广泛地“安全化”,正是因为构建于风险基础上的气候安全并不必然地引发紧急措施、敌友思维和军事化。气候安全概念告诉我们,风险社会中的安全政治正在被错综复杂的安全风险重构。

第二,气候安全威胁和风险分配具有不平衡性。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感受到的气候变化威胁的程度有差异,威胁的破坏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体现也不均衡。对于小岛屿国家来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相比其他陆上和高海拔地区国家就要紧迫得多。治理不良的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安全风险影响的程度更深。发展不足、资源紧张、族裔矛盾、传染性流行病和荒漠化等问题,已使那些缺乏局势控制和政策实施能力或结构过于软弱的国家无法满足其人民的基本需要。气候变化更是不仅放大了上述业已存

在的脆弱因素,还带来了诸如物种改变、气候灾害或海平面上升等新的安全问题。总的来说,国家的发展程度越差,为气候变化付出的代价越高。其次,气候安全威胁的导因和后果在时空上分离,二者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区域层次和治理领域。气候变化是一种全球层次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在海拔、地缘、全球化参与度不同的国家中可能引发不同的政治后果。小岛屿国家、政治军事大国更加重视气候变化的安全意义,将其置于安全议程之中。贸易大国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安全中的经济含义。南方国家警惕气候安全可能对发展构成的限制。产油国则对气候威胁重视不够。对加拿大和俄罗斯这样的高纬度国家而言,气候变化影响在一些领域反而成为利好因素。

气候威胁和风险分配的不平衡在国际安全结构中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气候威胁和风险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像财富一样附着于阶级模式上。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伴随着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不平等,个人、国家的气候威胁/风险地位也是不平等的。^① 这种不平等造成了政治行为体间的信任缺失。当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议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公平分配减排责任的矛盾即是这种不平等的集中反映。

第三,气候安全问题的解决手段具有多元性。环境领域与其他领域相比展示出更大的安全化进程,但是只有成功率相对小的安全化步骤。^②气候安全亦是如此。这是因为,一方面,气候安全的威胁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非直接的、非存在性的风险。气候安全的对抗前沿停留在社会边界内;只有当风险聚集并跨过一定的“门槛”时,气候政治的安全化^③才可能出现。另一方面,气候安全威胁并非源于外在的进攻者,或者说是敌对的“他者”,而是源于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正如拉斯穆森所说,气候变化可能会产生极大的潜在安全影响,但是答案不能仅限于军事方面。事实上,军事方面只是我们庞大工具箱中的一个工具而已。^④解决气候安全问题是否需要采取例外政治行动,^⑤需要在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风险、例外行动引发的后果和影响等因素进行充分的评估和权衡后才能作出决定。

①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7页。

② [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丹麦]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101页。

③ 此处的安全化系指维夫(《新安全论》)提出的军事方面的安全化(国家在“安全化”过程中享有特权,而且国家把问题“安全化”时也倾向于手段的军事化)。

④ Speech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nders Fogh Rasmussen on Emerging Security Risks, Lloyd' of London, 2009, www.nato.int/cps/en/natolive/opinions_57785.htm,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15.

⑤ 本文中安全化了的例外政治行动,不仅包含军事方面,而且泛指那些打破既成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诸如,为了保护气候系统而限制国家主权、个人自由,实施地球工程进行气候干预等。参见 Chris Methmann and Delf Rothe, “Politics fo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The Logic of Apocalypse in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Security Dialogue*, Vol.43, No.4, 2012, pp.337-338, Note 3.

这种多元性提示我们要兼顾安全政治中的两种带有反差性的安全治理路径。一方面,无处不在的风险使得提前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潜在威胁做准备成为不可能。应对突发紧急事件需要布赞所谓的“安全化”逻辑,采取超越常态政治安全配置(dispositifs)的紧急措施。另一方面,潜在的风险和存在的威胁使得“预防逻辑”尤为重要。既然安全风险无法完全去除,那么最好的方法是管控风险。当威胁与脆弱性同时存在就会出现不安全。^① 去除威胁、管控风险以及通过治理使气候安全主体富有韧性(resilience),是气候安全政策的重要目标。

第四,气候安全主体多元并与责任者同一。气候安全主体具有多元性,国家、个人、人类都是气候安全的享有者。不同于那些非跨界性的环境安全问题,如国内水安全、荒漠化等威胁,气候变化威胁的责任者是非特指的,是一切依靠化石燃料生产、生活的人。所以说,气候安全威胁的责任者正是气候安全的享有者。另外,全球变暖不同于其他大气安全威胁,如臭氧层空洞,它的责任者名单中没有工业不发达的南方国家;然而,造成全球变暖的责任者包括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每一个化石能源消费者。因此,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除发达国家优先承担主要减排责任外,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在发达国家的帮助下开展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减排行动。

另外,气候安全还是联结安全问题的纽带,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气候变化-水-粮食,气候变化-水-能源,气候变化-领土,气候变化-健康等等,在这些安全锁链中气候安全成为了锁链上的联结点。气候变化对水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水资源分配改变会直接威胁到食品和能源生产。许多文献还证明了气候变化通过加剧水源环境恶化引发了暴力冲突。^②气候安全是一项跨领域的综合安全问题,气候安全因素应被融入于安全领域的各项政策考虑之中。气候安全还需要世界主义的安全维护方式。与处理跨界环境问题等全球公共问题一样,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家地理边界的作用在下降,各国无法单独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在气候安全主体间相互依赖的背景下,气候安全主张共同安全。

^①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p. 73.

^② 例如1997年IPCC报告指出,在拉丁美洲,气候变化相关的影响作用于水资源,足以在国家、地区和取水者之间引发冲突。气候相关的环境退化不断增长可能会加深地区国家间和国际冲突。《斯特恩报告》(2006)也指出,来自气候变化的打击引起了暴力冲突,冲突的高风险地区有如西非、尼罗河盆地和中亚。参见IPCC(1995)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PCC(1997)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Nicolas Stern (2006) Executive Summary。

四 结 语

本文着重讨论了气候变化的安全意涵,试图对气候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首先,文章回顾了气候变化与安全研究的发展历程,发现气候安全研究历经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且囊括了气候安全化研究、安全纽带研究、现代风险社会中的气候安全等研究领域。其次,文章借鉴概念分析法,通过与环境安全相比较,尝试界定气候安全的概念。最后,文章归纳气候安全的特征,并分析“气候安全”对安全研究的启示与意义。

本文认为,“气候安全”可被定义为个人、国家、国际组织乃至全人类享有的稳定的、适宜生存的气候系统,免于人为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引发的威胁和风险的干扰,并须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加以维护的安全追求。气候安全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五点,即气候安全的威胁和风险二元一体、安全威胁和风险分配不平衡、安全主体多元并与责任者同一、解决手段具有多元性、构成联结安全问题的纽带以及安全维护方式的世界主义。最后,文章指出气候安全对安全政治的启示在于:首先,风险社会中的安全政治正在被纷繁复杂的安全风险重构;其次,气候威胁和风险分配的不平衡造成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再次,气候变化的安全威胁和风险提示我们需要兼顾两种带有反差性的安全治理路径。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在概念界定部分,基于气候与环境的自然关联,通过与环境安全概念要素比较,尝试给“气候安全”下一定义。但是,一方面,环境安全研究并不十分完备,其安全主体和研究层次被批评为过于宽泛;另一方面,鉴于全球气候系统并非一成不变,气候变化是一个构筑于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政治议题,至今仍不时有气候变化怀疑论的新证据抛出,全球气候治理也需以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技术创新为支撑,因此,本文中的气候安全概念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修正。但作者仍希望以此文抛砖引玉,为气候安全研究添砖加瓦,与学界共同进步。

(作者简介:傅聪,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责任编辑:莫伟)